

# 唐廷桂正名考

賓睦新

**[摘要]** 唐廷桂乃唐廷樞之兄、怡和洋行買辦。在相關研究論著中出現了各種變異或錯誤的稱法，有的流傳很廣、影響深遠。通過梳理唐氏族譜和各種相關史料，證實唐廷桂是正名，唐植是原名，唐亞植是乳名，唐國華是曾用名，唐茂枝是諱稱，唐茂之是唐茂枝誤寫，唐傑、唐實、譚亞祺、童·阿奇、唐阿植、唐阿七是英文名回譯錯誤，唐廷植是研究者創造的錯誤名。

**[關鍵詞]** 唐廷桂 唐植 唐國華 唐茂枝 唐廷植 唐廷樞

唐廷桂和唐廷植兩個名字，實為一人，但是自 20 世紀 70 年至今，“唐廷植”這個錯誤名字流傳很廣、影響頗深，很多論著都使用了“唐廷植”這個錯誤名字，甚至連唐氏族人都受此影響，造成各種誤解。隨着唐廷樞研究的深入，相關研究者發現這一錯誤，試圖糾正，但是由於史料不足及考證不夠深入，“唐廷植”這個錯誤說法依然根深蒂固。本文擬通過梳理唐廷桂家族文獻和研究成果，逐一考訂唐植、唐亞植、唐國華、唐茂枝、唐廷桂、唐廷植、唐阿植、唐傑、唐實、譚亞祺、童·阿奇、唐阿七、唐茂之等名字的由來和正誤，對各種用法溯本探源，務求去偽存真、正本清源。

## 一、緒論

唐廷桂（1828—1897），字建安，號茂枝，清代廣東香山縣唐家村人（今珠海唐家灣鎮），1839 年入讀澳門馬禮遜教育協會學校（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School，簡稱馬禮遜學校或者馬公書院），1842 年隨校遷往香港繼續學業，1843 年擔任英國駐上海第一任領事巴富爾（George Balfour）的翻譯，1845 年回校繼續學業，1847 年兼任香港巡理府法庭傳譯員，1849 年因馬禮遜學校關閉而轉學至聖保羅書院（St. Paul's College），1851 年辭職赴舊金山，1852 年任陽和會館通事、總董，1859 年回國，1861 年任江海關通事，1865 年赴香港經營華熙糖局（Wahee Smith & Co.），1871 年任天津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買辦，1873 年任上海怡和洋行總買辦。唐廷桂之父唐方玠（1799—1864），字廣善，號寶臣，娶梁氏，生四子：廷桂、廷樞、廷庚、

**作者簡介：**賓睦新，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國際關係專業博士生、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廷堅。<sup>①</sup>其大弟唐廷樞（1832—1892），字建時，號景星，亦畢業於馬禮遜學校（1841—1849），而後師從英國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曾任香港巡理府法庭傳譯員（1851—1858）、江海關通事（1858—1861）、怡和洋行總買辦（1863—1873）、輪船招商局總辦（1873—1885）、開平礦務局總辦（1878—1892）等職。其二弟唐廷庚（1835—1896），字建廉，號應星，1843年入讀馬禮遜學校，1849年師從英國傳教士理雅各，1856年在香港最高法院特納律師（George Cooper Turner）處做了幾個月的職員，<sup>②</sup>參加了一些法庭申述，<sup>③</sup>1858年跟隨唐廷樞前往上海謀生，<sup>④</sup>1864年任粵海關初級職員，<sup>⑤</sup>1873年跟隨唐廷樞入職輪船招商局，任粵局總辦（員董），1885年返鄉定居，直至去世。<sup>⑥</sup>幼弟唐廷堅（1843—1862），字建操，號梓貞，英年早逝。<sup>⑦</sup>唐廷樞投身洋務事業，推動了輪船運輸、保險、煤礦、鐵路、水泥等工商業的開辦與發展，被譽為中國近代工商業先驅。其成功事業，離不開唐氏兄弟的支持。唐廷桂是上海商界領袖之一，在唐廷樞接手輪船招商局和創辦開平礦務局籌資困難時，運用其強大的勢力，努力奔走，<sup>⑧</sup>召集親友和廣東同鄉認購股份，數次幫助唐廷樞化解危機。<sup>⑨</sup>唐廷庚加入輪船招商局，協助唐廷樞辦理局務，參與創辦仁和水險公司，開闢廣州至檀香山（舊金山）的太平洋航線，赴美交涉“和眾號”輪船被加徵關稅事宜，是輪船招商局的重要分管人員。<sup>⑩</sup>在唐廷樞的光環之下，唐廷桂和唐廷庚的事跡和功績被忽視，研究成果寥寥無幾，甚至連唐廷桂的名字都弄錯或者譯錯。

## 二、唐廷桂原名唐植

唐植是唐廷桂的原名。香港第一份中文報刊《遐邇貫珍》上刊登了兩則唐廷桂在舊金山的新聞，都是採用“唐植”。據《遐邇貫珍》1853年8月第1卷第1號刊登的《金山採金條規》載：“近接閱花旗國金山漢人採金條規，從該處總例摘出，系唐植譯漢文，因其字句間有未妥，特稍為改削，茲列於後。……癸丑年三月初三日，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四月初九日，漢人茂枝唐植。”<sup>⑪</sup>又據《遐邇貫珍》1854年4月第2卷第3—4號合刊載：

<sup>①</sup>《唐景星家譜》，編者和抄錄時間不詳，珠海博物館唐越先生提供。

<sup>②</sup>Carl T. Smith, “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Tong Brothers: Pioneer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Commerce and Industry,” *Chung Chi Journal*, Vol. 10, No.1 & 2 (1971), p. 85.

<sup>③</sup>Parliamentary Papers, House of Commons and Command, Vol. 48, 1860, China: Hong Kong, pp. 283, 449.

<sup>④</sup>Eliza J. Gillett Bridgman,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s in China: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New York, 1864, p. 241.

<sup>⑤</sup>唐廷庚在粵海關任初級譯員，僅1864—1865年有史料記載，其後未見記載。其一：*The Chronicle and Directory for China, Japan, & the Philippines for 1864*, Hong Kong, p. 169. 其二：*The Chronicle and Directory for China, Japan, & the Philippines for 1865*, Hong Kong, p. 244.

<sup>⑥</sup>*The 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August 7 1896, Shanghai.

<sup>⑦</sup>《唐景星家譜》，編者和抄錄時間不詳，珠海博物館唐越先生提供。

<sup>⑧</sup>“The Obsequies of the Late Mr. Tong Mow Che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September 3 1897.

<sup>⑨</sup>[清]經元善：《中國創興紡織原始記》，虞和平編：《經元善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87頁。

<sup>⑩</sup>賓睦新：《輪船招商局員董唐廷庚史事考述》，林廣志主編：《唐廷樞研究》第1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79—97頁。

<sup>⑪</sup>《遐邇貫珍》（香港）1853年8月第1卷第1號，第10—12頁。

“近閱金山上年十一月十九日新聞紙，內載唐植經手斂湊四邑會館花紅銀一千元，致送該處捕廳署之士兵以為酬勞，因其地有著名劫盜濯阿儉逞兇恣劫中土掘金人，被其掠財害命者指不勝屈。”<sup>①</sup>1859年左右，唐廷桂從舊金山返回中國，仍繼續使用“唐植”為名。唐廷樞編《英語集全》正文注明：“羊城唐廷樞景星甫著，兄植茂枝，弟庚應星參校，陳恕道逸溪、廖冠芳若溪全訂。”<sup>②</sup>

“亞植”是唐廷桂的乳名，乃是他人對“唐植”的親近稱呼。亞植之名，能查到最早記錄是1843年馬禮遜學校年會報告上的學生名冊，原文為“Achik，亞植，入學年齡11，籍貫T'óngká，入學時間1839年11月4日”。<sup>③</sup>施其樂（Carl T. Smith）《歷史的覺醒——香港社會史論》（*A Sense of History: 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載：“法庭爭取有華人傳譯員的編制。在這當中首先是唐亞植，又名唐茂枝、唐廷植，他於1847年10月16日獲任。他曾在馬禮遜學校讀書。”<sup>④</sup>劉伯驥《美國華僑史》亦採用唐亞植之說：“士比亞牧師，於一八五五年二月與三月在其東涯新錄發表，由四大會館於一八五三年所供給僑民的人數，與陽和會館通事唐亞植（Tong K. Achick），於一八五四年將四大會館首要在加州州議會礦產與採礦委員會供詞繙譯，透露當時五大會館所屬會員的人數。”<sup>⑤</sup>何光嶽《漢源流史》一書亦採用此說：“唐亞植，三藩市陽和會館主席。”<sup>⑥</sup>陳雅晴《亦趨亦離：早期港英殖民政府的華人譯者（1843—1900）》一文也是如此：“唐亞植（Tong Achik/Achick），又名廷植（Tong T'ing-chih/Tingzhi）、茂枝（Tong Mow-chee），1828-1897。”<sup>⑦</sup>該文還將唐廷桂之名誤為“唐廷植”。<sup>⑧</sup>

### 三、唐傑、唐實、譚亞祺、童·阿奇、唐阿植、唐阿七是英文名回譯錯誤

唐氏兄弟先後入讀馬禮遜學校，皆取有英文名字。據馬禮遜學校1843年度報告清晰記載，Achik，亞植，入學年齡11，籍貫T'óngká（唐家），入學時間1839年11月4日；Akü，亞驅，入學年齡10歲，籍貫T'óngká，入學時間1841年11月1日，離校時間1842年1月1日；Afü，亞扶，入學年齡8歲，籍貫T'óngká，入學時間1843年4月

<sup>①</sup>《遐邇貫珍》（香港）1854年4月第2卷第3—4號合刊，第7頁。

<sup>②</sup>[清]唐廷樞：《英語集全》，同治元年（1862）廣州緯經堂版。

<sup>③</sup>Samuel Wells Williams, *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Macao, 1843, pp. 9-11.

<sup>④</sup>施其樂（Carl T. Smith）：《歷史的覺醒——香港社會史論》（*A Sense of History: 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宋鴻耀譯，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年，第113頁。

<sup>⑤</sup>劉伯驥：《美國華僑史》，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第162頁。

<sup>⑥</sup>何光嶽：《漢源流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16頁。

<sup>⑦</sup>陳雅晴：《亦趨亦離：早期港英殖民政府的華人譯者（1843—1900）》，王宏志主編：《翻譯史研究》第5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63—313頁。

<sup>⑧</sup>Christopher Munn, *Anglo-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1880*, Richmond: Curzon Press, 2001, p. 443.

7 日。<sup>①</sup>其中亞植 Achik 是唐植，即唐廷桂，此後自署 Tong K. Achick，又出現 Tong Achick、Tong Chik<sup>②</sup>等寫法，<sup>③</sup>因號茂枝又寫作 Tong Mow Chee。亞驅 Akū 是唐廷樞，又有 Akou、<sup>④</sup>Akue、<sup>⑤</sup>Tong Akū<sup>⑥</sup>或 Tong Ting-Ku 等寫法，因號景星又寫作 Tong King-Sing。亞扶 Afū 是唐廷庚，又有 Afoo、Afu 等寫法，因名而寫作 Tong Ting-Keng，又因號應星而寫作 Tong Ying Sing。以上是唐廷桂及其兄弟之英文名字情況。

唐傑之名，譯自 Tong Chik，最早見於徐鳳石和惲鐵樵所譯容閔自傳《西學東漸記》（*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兩人將英文原文 “I entered the school in 1841. I found that five other boys had entered ahead of me by one year...The names of five boys were: 1.Wong Shing; 2.Li Kan; 3.Chow Wan; 4. Tong Chik; 5. Wong Foon.”<sup>⑦</sup>譯為“予入是校，在一八四一年，先我一年而入者，已有五人：黃君勝、李君剛、周君文、唐君傑與黃君寬也。”<sup>⑧</sup>兩人因為不熟悉馬禮遜學校之事，故而張冠李戴，將唐植（Tong Chik）錯誤地譯為“唐傑”，不知覺地造成了深遠影響。此後研究容閔之著作，皆採用了此說，甚至將 Tong Chik 誤為唐廷樞。如勒法格（Thomas Edward La Fargue）寫道 “Tong Chik, better knows as Tong King-sing, became a famous business man.”<sup>⑨</sup>（譯文：唐植，即眾所周知的唐景星，成為了著名商人）。高宗魯翻譯勒法格著作，亦接受了此說法，譯為“同時入校者尚有五位中國學生，他們是：黃勝、黃寬兄弟，唐傑（景星）、李剛、周文等五人。……唐傑（景星），成為鉅賈，曾創辦中國第一個‘輪船招商局’”。<sup>⑩</sup>又如李志剛將 Achik 譯為“亞傑”、Akū 譯為“亞駒”、Afu 譯為“亞富”，<sup>⑪</sup>實際上應該是亞植、亞驅和亞扶，<sup>⑫</sup>即唐廷桂、唐廷樞和唐廷庚。容閔自傳的各個譯本也接受了這個說法，如沈潛、楊增麒評註的《西學東漸記》記載：“唐傑（1832—1892 年）又名唐廷樞，廣東香山人，初在馬禮遜學校讀書，接着在另一英國教會學堂學習。”<sup>⑬</sup>王綦翻譯容閔自傳時，甚至將唐植

<sup>①</sup> Samuel Wells Williams, *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Macao, 1843, pp. 9-11.

<sup>②</sup>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pp. 13.

<sup>③</sup> Robert Hart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His Journals, 1863-1866*,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217-218, 229, 232-234, 243, 259.

<sup>④</sup>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Hong Kong: Noronha & Co., 1898, pp. 588, 639.

<sup>⑤</sup> Robert Hart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His Journals, 1863-1866*,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232-234. 又見 Parliamentary Papers, House of Commons and Command, Vol. 48, 1860, China: Hong Kong, pp. 4, 20.

<sup>⑥</sup> Parliamentary Papers, House of Commons and Command, Vol. 48, 1860, China: Hong Kong, pp. 47, 129, 137, 174, 187, 308-309, 311, 349-351, 354.

<sup>⑦</sup>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p. 13.

<sup>⑧</sup> [清]容閔：《西學東漸記》，徐鳳石、惲鐵樵譯述，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 年，第 7 頁。

<sup>⑨</sup> Thomas Edward La 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 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2-1881*,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42, p. 19.

<sup>⑩</sup> 勒法格（Thomas Edward La Fargue）：《中國幼童留美史》，高岩（即高宗魯）譯，香港：文藝書屋，1980 年，第 16 頁。

<sup>⑪</sup> 李志剛：《容閔與近代中國》，台北：正中書局，1981 年，第 47—49 頁。

<sup>⑫</sup> Samuel Wells Williams, *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Macao: 1843, pp. 9-11.

<sup>⑬</sup> [清]容閔：《西學東漸記》，沈潛、楊增麒評註，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76 頁。



Tong Chik 譯為“唐實”，黃寬 Wong Afun 譯為“王寬”，<sup>①</sup>這就錯得更厲害。石霓翻譯容閔自傳，仍將唐植 Tong Chik 譯為“唐傑”，“唐傑也未見確切的生平事跡。不過，他似乎一直被認為就是唐廷樞。……但有資料標明，唐廷樞比容閔小四歲，比容閔晚入馬禮遜學校，是 1842 年才入讀香港馬禮遜學校的，並且是與哥哥唐廷植、弟弟唐廷庚同時進校的。……若是這樣，那麼唐傑則該是另一個人了”。<sup>②</sup>石霓經過一番考證，認為唐傑不是唐廷樞，而是唐氏三兄弟之外的另外一個人，這也是一個很明顯的錯誤。張偉保在《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校》載：“由於這份名單將亞植（Achik）誤譯為亞傑，引致後來研究者很大的誤會。更有學者張冠李戴地誤將唐廷植理解為其弟唐廷樞。事實上，據第一批名錄所列，Achik 是 11 歲入讀馬禮遜學堂，其出生年份應為 1828 年。而唐廷樞……，其出生年份為 1832 年。兩者相差四年，故 Achik 絕不可能是唐廷樞，而只能是他的兄長唐廷植。這個錯誤或始自容閔的英文自傳的中譯本《西學東漸記》（*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的錯誤開始。”<sup>③</sup>從而確定 Tong Chik 不是唐廷樞，而是“唐廷植”，並且指出源頭是《西學東漸記》。此外，《容閔——中國留學生之父》、<sup>④</sup>《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sup>⑤</sup>《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sup>⑥</sup>《容閔年圖譜：中國留學生之父》、<sup>⑦</sup>《容閔傳》、<sup>⑧</sup>《記住容閔》<sup>⑨</sup>等著作，仍是採用了將唐植 Tong Chik 譯為唐傑的錯誤。2006 年，唐氏族人唐紹明發文澄清，指出徐鳳石和惲鐵樵將 Tong Chik 譯為唐傑是錯誤，以及勒法格將唐植誤解為唐廷樞也是錯誤的，“唐廷植和唐廷樞不是同一人”，“由於這兩本書成書較早，被認為最可信，因此‘A-Chik 就是唐廷樞’的說法不脛而走，在筆者迄今所見大陸和台灣有關留美幼童的書中，被普遍採用。然而這一說法是不正確的”。<sup>⑩</sup>然而，此說並未引起學界注意，錯誤用法仍在流傳。王志通和左滕慧子譯註的容閔自傳，仍舊延續了前人的錯誤，“唐傑（1832—1892），是唐廷樞的初名，字建時，號景星，又號鏡心，廣東香山人，編著《英語集全》，1892 年

<sup>①</sup> [清]容閔：《我在美國和在中國生活的追憶》，王綦譯，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第 8 頁；[清]容閔：《西學東漸記》，王綦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8 頁。

<sup>②</sup> 石霓譯註：《容閔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 年，第 12、18—19 頁。

<sup>③</sup> 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第 52 頁。

<sup>④</sup> 李喜所：《容閔——中國留學生之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年，第 15 頁。

<sup>⑤</sup> Kenneth Everett Folsom, *Li Huang-Chang: Friends, Guests, and Colleagues: A Study of the Mu-fu System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4, p. 189. 該書中文譯本：[美]K. E. 福爾索姆：《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劉悅斌、劉蘭芝譯，劉存寬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第 136 頁。

<sup>⑥</sup>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47. 中文譯本：[美]柯文：《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雷頤、羅檢秋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58 頁。

<sup>⑦</sup> 許小華：《容閔年圖譜：中國留學生之父》，台北：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15 年，第 36 頁。

<sup>⑧</sup> 劉中國、黃曉東：《容閔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 年，第 27 頁。

<sup>⑨</sup> 林小濤編著：《記住容閔》，廣州：羊城晚報出版社，2017 年，第 15 頁。

<sup>⑩</sup> 唐紹明：《唐國安是唐廷樞之子嗎？——有關抓還唐氏的三則史實》，珠海容閔與留美幼童研究會主編：《容閔與科教興國——紀念容閔畢業於耶魯大學 150 週年論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 年，第 286—288 頁。

病逝於天津”，<sup>①</sup>以及《從“同文三館”起步》、<sup>②</sup>《沉重的啟航——晚清企業精神的興起》、<sup>③</sup>《中美相遇——大國外交與晚清興衰（1784—1911）》<sup>④</sup>等著作。

更甚者，將 Tong Achick 翻譯成“譚阿祺”和“童·阿奇（Tong K. Achick）”。據《華人的舊金山——一個跨太平洋的族群的故事，1850—1943》載：“馬禮遜學校是廣東東部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基督教學校，在它第一屆的六名學生中，有三名在 1847 年跟隨他們的美國老師——薩繆爾·R·勃朗來到了美國。在另外三人中，至少有兩人——李根和譚阿祺（音譯）加入了 19 世紀 50 年代前往加利福尼亞的移民潮。”<sup>⑤</sup>又據《華工出國史料匯編》載：“根據斯皮編制的數字和 1853 年四家會館提供的數字以及 1854 年童阿奇（Tong K. Achick）提出的估計數，可以看出各縣同鄉會的發展情況。”<sup>⑥</sup>

唐阿植之名，乃“唐亞植”之變異，出現於《加利福尼亞州的中國人》，<sup>⑦</sup>原文為：“唐亞植（又叫唐植、唐茂枝）和李根，他們都是馬禮遜紀念學校的學生。在 1852 年初，唐亞植隨叔父前往加州，不久為就成為華僑社會的中顯赫人物，充當華僑與加州當局的中間人。除了英語能力，唐亞植熟知歐洲禮儀，因此能融入西方社會和政治世界。”<sup>⑧</sup>

唐阿七之名，是回譯唐亞植的英文名 Tong A-chick 或 Achik 之誤。赫德（Robert Hart）稱唐廷桂為 Tong A-Chik 或 A-Chik，<sup>⑨</sup>唐廷樞為 Tong Akue 或 A-kue。<sup>⑩</sup>陳絳翻譯《赫德日記》，錯誤地將唐廷桂譯為“唐阿七”，將唐廷樞譯為“唐阿九”，原文為：“關於阿七，我說他必須把事情做好：作為一個薪資豐厚的通事，經常接受饋禮。從一個人那裏就收到五百兩之多。跡近敲詐勒索，這是難以容忍的。他告訴我據說繳納的稅款有些在道台和稅務司之間分掉！我對阿七感到遺憾。……關於唐阿七，他已特別吩咐獄卒無論如何不要去騷擾他，而且獄卒答應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寬大處理。……昨日唐阿九為了他兄弟（哥哥）的事來看我，儘管有道台的吩咐，獄卒仍然待他非常之壞。……一個月之後，阿七接受了八月中秋節禮。他被抓起來，投入監獄。……阿七是關在普通監獄，像人和別的犯人一樣，他現在備受中國監獄所常有的折磨。……阿九提出讓他繳一筆罰金從輕發落……他們已停止對阿七嚴刑拷問。他再次下令叫人們不要騷擾阿七之後，對獄中人還在拷打他，大怒不已。……撫台

<sup>①</sup>容闕：《耶魯中國人：容闕自傳》，王志通、左滕慧子譯註，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 年，第 13 頁。

<sup>②</sup>季壓西、陳偉民：《從“同文三館”起步：語言障礙與晚清近代化進程》，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 年，第 445 頁。

<sup>③</sup>溫宏建：《沉重的啟航——晚清企業精神的興起》，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4 年，第 49 頁。

<sup>④</sup>王元崇：《中美相遇——大國外交與晚清興衰（1784—1911）》，上海：文匯出版社，2021 年，第 253 頁。

<sup>⑤</sup>陳勇：《華人的舊金山——一個跨太平洋的族群的故事，1850—194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48 頁。

<sup>⑥</sup>陳翰笙主編：《華工出國史料匯編》第七輯“美國與加拿大華工”，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第 113 頁。

<sup>⑦</sup>唐有淦編著：《唐家地區華僑史話》，珠海市香洲區政協文史委員會編印，1992 年，第 27 頁。

<sup>⑧</sup>冼玉儀：《穿梭太平洋——金山夢、華人出洋與香港的形成》，林立偉譯，香港：中華書局，2019 年，第 44 頁。

<sup>⑨</sup>Richard J. Smith, John King Fairbank, Katherine F. Bruner, *Robert Hart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His Journals, 1863-1866*,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217-218, 229, 232-234, 243, 259.

<sup>⑩</sup>*Robert Hart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His Journals, 1863-1866*,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232-234.

已將阿七一案轉交北京審理。……他已奏請摘除唐阿七頂戴，以便可以給他更為嚴厲的處理。……我曾致函李撫台，盡力為唐阿七獲釋做些事。……阿七的事，他會盡力（他指李撫台，即李鴻章），我建議他可以再次上奏。他說‘賁’一確定，他們就能夠立即決定阿七能否出錢擺脫困境，並說他在此期間不會受到虐待。”<sup>①</sup>“唐阿七”和“唐阿九”之名，應是譯者不知 Tong Achick 或 Tong Achik 乃唐亞植之故。其後，楊智友的《唐阿七案件》亦採用“唐阿七”和“唐阿九”兩個譯名，<sup>②</sup>應該是源於陳絳之譯法，造成以訛傳訛的錯誤。

#### 四、唐國華是化名

1861 年，唐廷樞辭去江海關之職，次年唐廷桂以“唐國華”之名入職江海關，擔任通事。1863 年唐廷桂因涉嫌賄案被捕入獄，在丁日昌和李鴻章的奏摺中，多以“唐國華”稱之。如丁日昌《附詳報效機器鐵廠》載：“茲查新關通事唐國華等，遊歷外國多年，熟悉洋匠。……唐國華與該商相習有素，合之張燦秦吉等，共集資四萬兩，購成此座鐵廠。……並據新關各眾通事出結，從後再不敢效尤需索，亦不邀唐國華等暗中幫辦。……將唐國華、秦吉、張燦等先行取保釋放。……除將唐國華等報效機器鐵廠事宜另案詳呈。”<sup>③</sup>又據《請辦海關唐國華勒索詳》載：“詎有新關通事唐國華，並扞手張燦、秦吉等，於中秋節時，仍向各行棧私收包件規費，實屬目無法紀。……即將唐國華等劄發上海縣收管……據唐國華供稱：廣東香山人，於咸豐九年在福建報捐同治銜，領過藩司實收，尚未奉到部照，現在新關當通事兼翻譯公文，每月辛工銀二百七十五兩，總理進出稅單。……乃通事唐國華及扞手張燦等在官人役。……請將唐國華同治職銜轉請斥革。……職署道伏查通事唐國華、扞手張燦、秦吉等在新關充役有年。……將唐國華同知銜奏請革辦。……唐國華等已有親筆供。”<sup>④</sup>“同治四年夏間，臣於蘇松太道任內商議設立機器廠，適通事唐國華有案，當諭飭捐辦此廠，稟准前督臣李鴻章奏明逐漸擴充。”<sup>⑤</sup>

丁日昌將“唐國華案”呈報給江蘇巡撫李鴻章，在李氏案牘中亦有兩份奏摺涉及“唐國華案”。據李鴻章《斥革私收包件費之海關官員片（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五日）》載：“詎有新關通事唐國華並扞手張燦、秦吉等於中秋節仍向各行棧私收包件規費。……乃通事唐國華及扞手張燦、秦吉等在官人役。……惟唐國華供係報捐同知銜。臣查通事唐國華、扞

<sup>①</sup>[美]理查德·J·司馬富(Richard J. Smith)、[美]約翰·K·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美]凱瑟林·F·布魯納(Katherine F. Bruner)編：《赫德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赫德日記(1863—1866)》，陳絳譯，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年，第289—338頁。

<sup>②</sup>楊智友：《唐阿七案件》，《看歷史》（成都）2014年第3期；又見：楊智友：《晚清海關》，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2—78頁。

<sup>③</sup>[清]丁日昌：《附詳報效機器鐵廠》，趙春晨編：《丁日昌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61頁。

<sup>④</sup>[清]丁日昌：《請辦海關唐國華勒索詳》，趙春晨編：《丁日昌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62—263頁。

<sup>⑤</sup>[清]丁日昌：《請辦海關唐國華勒索詳》，趙春晨編：《丁日昌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1頁。



手張燦、秦吉等在新關充役。……應請旨將唐國華捐職同知銜即行斥革。……唐國華歷在各口任事，各關人役多其黨羽。……唐國華着即行斥革嚴訊究辦。”<sup>①</sup>又據《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折（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載：“茲據丁日昌稟稱，上海虹口地方有洋人機器鐵廠一座，能修造大小輪船及開花炮、洋槍各件，實為洋涇浜外國廠中機器之最大者。前曾問價，該洋商索值在十萬洋以外，是以未經議妥。茲有海關通事唐國華歷遊外國多年，熟習洋匠，本年因案革究，贖罪情急，與同案已革之扞手張燦、秦吉等願共集資四萬兩購成此座鐵廠以贖前愆。……當查唐國華一案既情有可原，報效軍需贖罪亦有成案可援。……除唐國華贖罪一案另片附奏並諮總理衙門外，所有置辦外國鐵廠機器並局製造並京營弁兵分廠學習緣由。”<sup>②</sup>再據《唐國華贖罪片（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載：“前據江海關道丁日昌查出新關已革通事捐職唐國華等國私收陋規，詳請革訊，經臣在蘇撫任內附片具奏。同治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奉旨：唐國華著即行斥革，嚴訊究辦。……唐國華之母譚氏以伊子曾在外國多年。……緣唐國華係廣東香山縣人，咸豐九年在福建報捐州同職銜，同治元年在上海新關充當通事兼翻譯洋字公文，總理進出稅單。……華商往往不能辨識，屬托唐國華翻譯，偶然送給銀兩酬勞。……與唐國華情事相同。約計唐國華每節收受紋銀二千兩。……詎至中秋節各商仍送唐國華規銀一千九百八十三兩。……唐國華曾在外國多年，與領事、商人熟悉。……茲唐國華出銀二萬五千兩，張燦、秦吉各出銀七千五百兩，共銀四萬兩合辦洋鐵廠一座，核與納贖之例相符。查唐國華總計得受過銀一萬三千九百兩零。……應請將唐國華、張燦、秦吉准予寬宥，免其治罪，庶於情法兩得其平。唐國華居心貪鄙，前革職銜應不准其開復，追起實收另請諮銷，並與張燦、秦吉一體革役，並聲明唐國華係州同銜，係因該犯錯供所致，今已更正等情，會詳請奏前來。臣查唐國華等均係在關人役，輒敢收取規費，有干例禁。……所有已革通事唐國華等一案擬准贖罪緣由。”<sup>③</sup>此案因“唐國華”違規收取商人銀兩而起，以“唐國華”籌資二萬五千兩規銀，另兩人各籌七千五百兩規銀，購買美國商人所辦“旗記鐵廠”捐給朝廷，從而得以贖罪。但是不能官復原職，不能再在海關工作，必須離開上海。

另據《創辦江南製造局記》載：“上海虹口創設機器製造局，飭江海關道丁日昌訪購得洋人機器廠一座，能修大小輪船及開花炮洋槍各件，實為洋涇浜外國廠中機器之最大者，需價四萬兩，係前海關通事唐國華等集資報效。”<sup>④</sup>

在唐廷桂離開江海關後，未再用唐植或者唐國華，而用唐廷桂或唐茂枝。

<sup>①</sup> [清]李鴻章：《斥革私收包件費之海關官員片（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五日）》，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1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01—602頁。

<sup>②</sup> [清]李鴻章：《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摺（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2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00—202頁。

<sup>③</sup> [清]李鴻章：《唐國華贖罪片（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2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02—203頁。

<sup>④</sup> 轉引《上海市大觀》，載熊月之主編：《稀見上海史志資料叢書》第7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第48頁。



## 五、唐廷桂是正名

唐廷桂是正名，多見其信函和報刊公開信的署名，以及報刊的報道。據《格致書院格致教習逝世啟》載，最後簽署“大清光緒十六年十月十二日，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年十一月廿三日，格致書院董事唐廷桂、華蘅芳、徐鍾、徐華封、黃恩詔、黃鐔、何丹書、王韜、張煥綸拜唁”。<sup>①</sup>據光緒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唐廷桂等致盛宣懷函記載：“杏翁觀察大人閣下。至祈察收兩銷，伏候賜復為禱。專此肅布，敬請暑安。愚弟唐廷桂、經元善、施善昌、葛、王、葉、席裕祺、楊頓首六月廿九”。<sup>②</sup>如《格致書院設塾教習英文章程規條》署名為“專理書院董事怡和洋行唐廷桂”，<sup>③</sup>以及《煙臺繅絲局告白》署名為“唐廷桂謹啟”。<sup>④</sup>又如《新聞報》載《廣肇公所內協賑所同人唐廷桂、李文明、韋華國等謹啟》、<sup>⑤</sup>《申報》載《施粥開廠（上海虹口元濟善堂董事唐廷桂等謹啟）》等等。<sup>⑥</sup>

在唐廷桂去世後所修的唐氏家譜、族譜和上海地方志，是用“唐廷桂”之名。據珠海博物館唐越提供《唐景星家譜》記載：“誥授資政大夫二十世祖茂枝公，乃寶臣公長子也，諱廷桂，字建安，號茂枝，生於道光八年十一月十七日（1828年12月23日），終於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初七日（1897年7月6日）。在上海病故，享壽七十歲。”<sup>⑦</sup>該家譜抄錄時間不詳，但是可以確定是1897年唐廷桂去世之後，從而可以確定唐廷桂乃其名，唐茂枝乃其號。據《唐鄉賢祠全書》（唐德新纂修，光緒二十九年刻本）記載：“清二十世祖誥授通議大夫諱廷桂，號茂枝公，香山房。”<sup>⑧</sup>該族譜1903年成書，距離唐廷桂去世不久，可信度較高。又據《上海縣續志》記載，“留嬰堂，在西新橋北，光緒十四年仁濟堂董賈振、蔣毓芬、張韋承、施善昌、葉成忠、唐廷桂等稟官創設。”<sup>⑨</sup>

唐廷桂之名，也常見於李鴻章、彭玉麟、張之洞等人的奏摺中。據彭玉麟和張之洞聯署的《會查兩廣總督參款折（光緒十年八月二十六日）》載：“查有候選道唐廷桂報效廣西軍火，經撫臣倪文蔚前在西撫任內，會同該前督奏明。”<sup>⑩</sup>又據李鴻章《唐梁氏捐賑旌獎片》載：“廣東香山縣人候選道唐廷桂之母命婦梁氏，捐助直賑洋銀二千元，合銀一千三百四十兩。”<sup>⑪</sup>

①《格致書院格致教習逝世啟》，《格致匯編》（北京）光緒十六年（1890）第五年，第43頁。

②李文海、夏明方、朱濟主編：《中國荒政書集成》第9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613—6614頁。

③《格致書院設塾教習英文章程規條》，《申報》（上海）1888年3月6日第4頁。

④《煙臺繅絲局告白（唐廷桂謹啟）》，《申報》（上海）1886年6月4日第6頁。

⑤《廣肇公所內協賑所同人唐廷桂、李文明、韋華國等謹啟》，《新聞報》（上海）1893年5月22日第9版。

⑥《施粥開廠（上海虹口元濟善堂董事唐廷桂等謹啟）》，《申報》（上海）1895年12月16日第4頁。

⑦《唐景星家譜》，編撰者和抄錄時間不詳，珠海博物館唐越先生提供。

⑧[清]唐德新纂修：《唐鄉賢祠全書》，光緒二十八年（1902）刻，三十三年（1907）增刻本。

⑨《上海縣續志》卷二“建置上”，民國七年（1918）鉛印本。

⑩[清]彭玉麟、張之洞：《會查兩廣總督參款摺（光緒十年八月二十六日）》，[清]彭玉麟：《彭玉麟集》第1冊，梁紹輝、劉志盛等校點，長沙：嶽麓書社，2008年，第375頁。

⑪[清]李鴻章：《唐梁氏捐賑旌獎片》，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8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54—256頁。

其他與唐廷桂同時代人的日記、遊記中，亦見“唐廷桂”之名。越南阮朝嗣德帝（1848—1883）歲貢使阮述與唐廷庚交際頗多，其途經上海往輪船招商局拜訪唐氏三兄弟，亦用唐廷桂之名，其原文為：“二月初一日，往招商局（在上海、天津為總局，各處為分局），訪唐應星，並見其兄茂枝（即廷桂），景星（即廷樞）。是夜，唐公兄弟招飲於泰和館。”<sup>①</sup>又據傅雲龍《遊歷日本餘紀》載，光緒十三年九月“十八日，訪怡和洋行執事唐廷桂，談假道諸國海程”。<sup>②</sup>

以上例子足以證明，唐廷桂是本人自署、官方常用及其後人認可的名字。

## 六、唐茂枝是諱號，唐茂之是誤用

唐茂枝之名源於唐廷桂號“茂枝”，唐氏經常自署唐茂枝，時人或後人根據中國傳統習俗，多以字號相稱，以示避諱和尊敬。上海和香港等地的報刊，報道唐廷桂之事，也常用“唐茂枝”之名。如《上海新報》刊登一則感謝高露雲律師的《頌詞》，署名為“華商林南甫、李德昌、梁鶴巢、陳定之、唐茂枝、李陞、何斐然、鄧鑑之、謝嘉、鄭耀、林子和、卓雨芬、梁兆、陳瑞南等拜題。選錄香港新報”。<sup>③</sup>又如上海報刊載有《上海四馬路高易公館協辦兩廣賑捐所唐茂枝等公啟》、<sup>④</sup>《照錄駐紮日本橫濱大清正理事羅少耕觀察覆唐茂枝觀察代訪癲瘋醫士函》、<sup>⑤</sup>《唐君茂枝經募各善士樂助本埠南市火災賑款清單》、<sup>⑥</sup>《請付添招股銀（董事韋文圖、唐茂枝、陳可良謹啟）》<sup>⑦</sup>等報道。

不少研究者採用“唐茂枝”作為名稱。如汪敬虞在撰寫唐廷桂傳記時，採用了“唐茂枝”這個名字，<sup>⑧</sup>日本學者阿部香織（Kaori Abe）博士的《通商口岸的仲介精英：唐茂枝及其上海夥伴（1873—1897）》（“Intermediary Elites in the Treaty Port World: Tong Mow-chee and His Collaborators in Shanghai, 1873-1897”）亦然。<sup>⑨</sup>

“唐茂之”之名，是“唐茂枝”之誤，大多出現在《申報》、《萬國公報》等上海報刊。如《申報》刊《限期繳銀》載：“宋彩於前日邀請徐雨之、唐茂之兩君來說，據述宋彩已借得銀三千五百。”<sup>⑩</sup>又有《工部覆信》載：“前聞有華人具稟於英工部局，請准令華人

<sup>①</sup> 陳荊和編注：《阮述〈往津日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第29頁。

<sup>②</sup> 羅森等：《早期日本遊記五種》，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1頁。

<sup>③</sup> 《頌詞》，《上海新報》（上海）庚午年七月二十四日（1870年7月24日）第394號第2頁。

<sup>④</sup> 《上海四馬路高易公館協辦兩廣賑捐所唐茂枝等公啟》，《字林滬報》（上海）1885年8月15日第5頁。

<sup>⑤</sup> 《照錄駐紮日本橫濱大清正理事羅少耕觀察覆唐茂枝觀察代訪癲瘋醫士函》，《字林滬報》（上海）1889年2月9日第1頁。

<sup>⑥</sup> 《唐君茂枝經募各善士樂助本埠南市火災賑款清單》，《新聞報》（上海）1894年6月15日第9版。

<sup>⑦</sup> 《請付添招股銀（董事韋文圖、唐茂枝、陳可良謹啟）》，《申報》（上海）1884年6月3日第7頁。

<sup>⑧</sup> 汪敬虞：《唐茂枝》，孔令仁、李德征主編：《中國近代企業的開拓者》下冊，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4—352頁。

<sup>⑨</sup> Kaori Abe, “Intermediary Elites in the Treaty Port World: Tong Mow-chee and his collaborators in Shanghai, 1873-1897”,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5, Issue 3(2015), pp. 461-480.

<sup>⑩</sup> 《限期繳銀》，《申報》（上海）1876年8月25日第2頁。

入外國公家花園遊賞，乃昨閱西子報見有工部局致華人熊經園、唐茂之等一函。”<sup>①</sup>另有《整頓書院》載：“上洋格致書院開設已閱九年，進來久無舉動，月之初八日，該書院集眾議事，唐景星、茂之昆季皆與會議。”<sup>②</sup>《萬國公報》刊有《中西書院年捐清單並啓》載：“怡和洋行賬房唐茂之捐洋二十員。”<sup>③</sup>

## 七、唐廷植是誤用誤傳

唐廷植乃是唐植之名誤用誤傳。唐廷植之名的源頭是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文中論及《英語集全》時提到，卷首並有“羊城唐廷樞景星甫著，兄（廷）植茂枝，弟（廷）庚應星參校，陳恕道逸溪，廖冠芳若谿全訂”字樣。<sup>④</sup>實際上，《英語集全》上的記錄為“羊城唐廷樞景星甫著，兄植茂枝，弟庚應星參校，陳恕道逸溪，廖冠芳若谿全訂”（載《英語集全》，同治元年廣州緯經堂版），劉廣京給唐植和唐庚加上一個“（廷）”字，出現了“唐廷植”和唐廷庚這個兩個名字。由於唐廷庚這個名字確實存在，所以造成後來者錯誤地認為“唐植”這個名字是“唐廷植”。

緊隨其後，施其樂教授（Carl T. Smith）在“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Tong Brothers, Pioneer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Commerce and Industry”（《中國代化工商業近先驅——唐氏兄弟之青年時代》）一文中，延續了劉廣京的說法，“The three brothers were Tong Mow-chee (T'ang Mao-chih) 唐茂枝 (Alias T'ang T'ing-chih) 唐廷植, known in his youth as A-chick 亞植, born 1828, died 1897.”<sup>⑤</sup>

汪敬虞撰寫了一系列研究買辦及唐廷樞和唐廷樞兄弟的著作，皆採用了“唐廷植”這個說法，以致傳播更加廣泛。其《唐廷樞研究》一書中，以“唐廷植”稱唐廷桂。<sup>⑥</sup>在《試論近代中國的買辦階級》中寫道：“他有一位哥哥，叫做唐茂枝（廷植），這個人可以說是當了一輩子買辦。”<sup>⑦</sup>在《唐茂枝》一文中提及：“唐茂枝（1827—1897年），又名唐國華，亦名唐廷植，大約國華是他的原名，廷植是他的宗族輩份名，而茂枝則是他在商界所用的號。”<sup>⑧</sup>又在《從唐氏三兄弟的歷史看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的產生》繼續採用“唐廷植”這個名稱，如“原來唐廷樞有兄弟三人，上有一個哥哥名叫唐廷植，下有一個弟弟叫唐廷

<sup>①</sup>《工部覆信》，《申報》（上海）1881年4月27日第2頁。

<sup>②</sup>《整頓書院》，《申報》（上海）1883年4月19日第2頁。

<sup>③</sup>《中西書院年捐清單並啓》，《萬國公報》（上海）1883年第724期。

<sup>④</sup>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清華學報》（台北）1961年第2卷第2期，第172頁。

<sup>⑤</sup>Carl T. Smith, “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Tong Brothers: Pioneer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Commerce and Industry”, *Chung Chi Journal*, Vol. 10, No.1 & 2 (1971), pp. 81-95. 該文收入施其樂之論文集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34-51.

<sup>⑥</sup>汪敬虞：《唐廷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112、154、170頁。

<sup>⑦</sup>汪敬虞：《試論近代中國的買辦階級》，《歷史研究》（北京）1990年第3期，第90頁。

<sup>⑧</sup>汪敬虞：《唐茂枝》，孔令仁、李德征主編：《中國近代企業的開拓者》下冊，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第344—352頁。

庚”。<sup>①</sup>其後的《中國現代化征程中的艱難跋涉——〈赫德日記〉中的一個啟示》<sup>②</sup>和《中國工商業現代化的開拓者：唐廷樞》<sup>③</sup>等著作，都是採用“唐廷植”一說。

因劉廣京、施其樂和汪敬虞研究買辦和唐氏兄弟較早，名氣之著、影響之廣，致使學界和社會各界採用其說，將唐廷桂誤為“唐廷植”，以致訛傳越久遠，一時難以糾正。自20世紀80年代至今，幾乎所有論著都使用了“唐廷植”這個錯誤名字。如《唐廷植》、<sup>④</sup>《唐廷樞》、<sup>⑤</sup>《鄭觀應評傳》、<sup>⑥</sup>《容閔傳》、<sup>⑦</sup>《唐廷植》、<sup>⑧</sup>《中國早期工業文明與唐廷樞》、<sup>⑨</sup>《香山文化簡論》、<sup>⑩</sup>《清末粵商所建戲園／戲院初探》、<sup>⑪</sup>《工商先驅唐廷植》、<sup>⑫</sup>《同治初年清政權的中興與旅滬香山買辦之關係——圍繞旅滬香山買辦向政府捐納的考察》、<sup>⑬</sup>《廣東通史（近代下冊）》、<sup>⑭</sup>《唐廷樞開平礦務局創業團隊成員分析》、<sup>⑮</sup>《馬禮遜教育協會（1836—1867）——關於中國和東南亞地區基督教教育慈善組織的個案研究》、<sup>⑯</sup>《東西萬花筒：顏永京牧師及其後人》、<sup>⑰</sup>《從唐廷樞看近代中國企業家精神的產生與發展》、<sup>⑱</sup>《留美幼童唐元湛家三代人的故事》、<sup>⑲</sup>《唐廷植》、<sup>⑳</sup>《外爭權益與內省公德——上海灘公園歧視華人社會反映的歷史解讀》、<sup>㉑</sup>《通商口岸的仲介精英：唐茂枝及其上海夥伴（1873—1890）》、<sup>㉒</sup>《第一代學堂教育》等等，<sup>㉓</sup>舉不勝舉。唐氏後裔及

<sup>①</sup>汪敬虞：《從唐氏三兄弟的歷史看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的產生》，《近代中國》（上海）2002年第12輯，第73—91頁。

<sup>②</sup>汪敬虞：《中國現代化征程中的艱難跋涉——〈赫德日記〉中的一個啟示》，《近代中國》（上海）2009年第19輯，第227—239頁。

<sup>③</sup>汪敬虞：《中國工商業現代化的開拓者：唐廷樞》，珠海：珠海出版社，2010年，第8、11、17、55—60、123頁。

<sup>④</sup>珠海市地方誌辦公室編：《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43頁。

<sup>⑤</sup>唐克敏：《唐廷樞》，徐矛主編：《中國十買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2—56頁。

<sup>⑥</sup>易惠莉：《鄭觀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79頁。

<sup>⑦</sup>劉中國、黃曉東：《容閔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年，第78頁。

<sup>⑧</sup>熊月之主編：《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8頁。

<sup>⑨</sup>胡海建：《中國早期工業文明與唐廷樞》，海口：南方出版社，2005年，第4、7、15、20、22—23、64頁。

<sup>⑩</sup>王遠明、胡波：《香山文化簡論》，《中山文史》第60輯，政協廣東省中山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2007年，第35頁。

<sup>⑪</sup>程美寶：《清末粵商所建戲園／戲院初探》，姜進、李德英主編：《近代中國城市與大眾文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108—109頁。

<sup>⑫</sup>楊靜儀：《珠海歷史名人故事集》，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38—40頁。

<sup>⑬</sup>易惠莉：《同治初年清政權的中興與旅滬香山買辦之關係——圍繞旅滬香山買辦向政府捐納的考察》，楊國榮主編：《思想與文化》第10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68—281頁。

<sup>⑭</sup>方志欽、蔣祖緣主編：《廣東通史（近代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67頁。

<sup>⑮</sup>楊磊、張玉清：《唐廷樞開平礦務局創業團隊成員分析》，《河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焦作）2012年第1期，第115—124頁。

<sup>⑯</sup>黃美樹（Thomas G. Oey）：《馬禮遜教育協會（1836—1867）——關於中國和東南亞地區基督教教育慈善組織的個案研究》，陶飛亞主編：《宗教慈善與中國社會公益》，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06頁。

<sup>⑰</sup>羅元旭：《東成西就：七個華人基督教家族與中西交流百年》，香港：三聯書店，2014年，第83、85頁。

<sup>⑱</sup>溫宏建：《沉重的啟航——晚清企業精神的興起》，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8頁。

<sup>⑲</sup>鄧潔：《留美幼童唐元湛家三代人的故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4、6、11—12、18頁。

<sup>⑳</sup>黎細玲編著；珠海市檔案局（館）編：《珠海人物》，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年，第427—428頁。

<sup>㉑</sup>熊月之：《外爭權益與內省公德——上海灘公園歧視華人社會反映的歷史解讀》，《學術月刊》（上海）2007年第10期，第132—139頁。

<sup>㉒</sup>Kaori Abe. “Intermediary Elites in the Treaty Port World: Tong Mow-chee and His Collaborators in Shanghai, 1873–1897,”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 Series, Vol. 25, No. 3 (July 2015), pp. 461–480.

<sup>㉓</sup>林準祥：《香港·開港——歷史新編》，香港：中華書局，2019年，第171—175頁。



族人甚至都受此影響，撰寫家族史文章採用“唐廷植”之說，如《唐廷樞傳略》、<sup>①</sup>《關於唐廷植生平》、<sup>②</sup>《“洋務運動”時期的實業家唐廷樞》、<sup>③</sup>《唐廷植、唐傑臣父子生平補充》、<sup>④</sup>《唐廷樞》、<sup>⑤</sup>《近代史時期傑出的華僑領袖：唐廷植》、<sup>⑥</sup>《在加利福尼亞州的中國人（*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sup>⑦</sup>《唐廷植》、<sup>⑧</sup>《唐康泰生平》、<sup>⑨</sup>《唐國安是唐廷樞之子嗎？——有關珠海唐氏的三則史實》、<sup>⑩</sup>《走進黃振球》等等，<sup>⑪</sup>頗為費解。

2001年，陳三井在研究中法戰爭時期的越南使節阮述時，因阮述與唐廷桂交往頗多，且在上海期間，與唐廷桂亦有交際，故日記中記載，皆是唐廷桂，而不是唐廷植。陳三井研究《阮述日記》，自然能夠發現問題，不再使用“唐廷植”這個錯誤名字，而是採用“唐廷桂”這個準確名字。<sup>⑫</sup>

2008年，靳環宇在《晚清義賑組織研究》一書中提及發現唐廷桂和“唐廷植”的問題：“據汪敬虞先生敘述，唐廷植（茂枝）係唐廷樞之兄。但據筆者逐年翻閱《申報》，見唐茂枝系名廷桂，當時《申報》中未發現有名唐廷植者，而僅唐廷桂一人，而根據兩人的經歷似應為同一人。是唐廷樞的哥哥唐茂枝既名廷桂又名廷植，還是本為兩人，待考。關於唐廷桂（茂枝）的名字問題可參閱《申報》。”<sup>⑬</sup>可惜該文淺嘗輒止，僅僅提出問題，未能解決問題。

近兩年，隨着唐廷樞研究的深入，特別是澳門科技大學成立“唐廷樞研究中心”，創辦《唐廷樞研究》輯刊，唐廷桂得到較多關注，陳曉平、<sup>⑭</sup>袁琴和何寧宇、<sup>⑮</sup>和賓睦新<sup>⑯</sup>

<sup>①</sup>唐佑鈞：《唐廷樞傳略》，《珠海文史》第7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43頁。

<sup>②</sup>唐佑鈞：《關於唐廷植生平》，《珠海文史》第8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9—74頁。

<sup>③</sup>唐有淦編著：《唐家村村史》，唐家鎮人民政府編印，1989年，第69—87頁。

<sup>④</sup>唐佑鈞：《唐廷植、唐傑臣父子生平補充》，《珠海文史》第10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4—127頁。

<sup>⑤</sup>唐佑鈞：《唐廷樞》，珠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珠海人物傳》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5—211頁。

<sup>⑥</sup>唐有淦：《近代史時期傑出的華僑領袖：唐廷植》，《珠海鄉音》（珠海）1992年第21期。

<sup>⑦</sup>唐有淦編著：《唐家地區華僑史話》，珠海市委香洲區政協文史委員會編印，1992年，第21頁。

<sup>⑧</sup>唐佑鈞：《唐廷植》，珠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珠海人物傳》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50頁。

<sup>⑨</sup>趙濟平：《唐康泰生平》，《珠海文史》（珠海）2005年第15輯，第226—230頁。

<sup>⑩</sup>唐紹明：《唐國安是唐廷樞之子嗎？——有關抓還唐氏的三則史實》，珠海容閣與留美幼童研究會主編：《容閣與科教興國——紀念容閣畢業於耶魯大學150週年論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年，第286—288頁。該文雖然說明了“唐廷植和唐廷樞不是同一人”，但是卻把唐廷桂的名字誤解為“唐廷植”。

<sup>⑪</sup>黃建德：《走進黃振球》，《民間影像》（上海）2012年第1輯，第159頁。

<sup>⑫</sup>陳三井：《中法戰爭遷徙越南使節研究：以阮述為例之討論》，許文堂主編：《越南、中國與台灣關係的轉變》，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2001年，第63—76頁。

<sup>⑬</sup>靳環宇：《晚清義賑組織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3頁。

<sup>⑭</sup>陳曉平：《慈善家唐廷桂與“華人不得入內”》，“澎湃”網站，[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73991](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73991)，2018年2月25日；陳曉平：《唐廷桂的公益慈善活動》，微信公眾號“香山研究”，2021年3月17日。

<sup>⑮</sup>施其樂（Carl T. Smith）著；袁琴、何寧宇譯：《中國近代工商業先驅——唐氏兄弟之青年時代》，林廣志主編：《唐廷樞研究》第1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98頁。

<sup>⑯</sup>賓睦新：《輪船招商局員董唐廷庚史事考述》，林廣志主編：《唐廷樞研究》第1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82—83頁。

等研究者指出“唐廷桂”乃真名，“唐廷植”乃誤傳，試圖糾正錯誤。蘇精、<sup>①</sup>湯開建、<sup>②</sup>趙殿紅、<sup>③</sup>袁琴、<sup>④</sup>何寧宇、<sup>⑤</sup>李梓傑<sup>⑥</sup>、賓睦新、<sup>⑦</sup>鄧潔等研究者，<sup>⑧</sup>已經採用“唐廷桂”作為準確名字。

檢索唐廷樞族譜、香山地方志、晚清文集和日記等，以及各種歷史文獻、晚清報刊之數據庫，皆只見“唐廷桂”而未見“唐廷植”，而“唐廷植”僅見於20世紀60年代至今的學術論文和研究著作之中，這足以說明“唐廷植”乃是研究者因誤解而創造的錯誤名，並非唐廷桂本人所用之名。

通過考證唐氏家族史料和梳理唐氏兄弟研究著述，唐廷桂各種名字的用法情況如下：唐廷桂乃其正名，唐植是原名，唐亞植是乳名，唐國華是化名，唐茂枝是諱稱，唐茂之是唐茂枝誤寫，唐傑、唐實、譚亞祺、童·阿奇、唐阿植、唐阿七是回譯錯誤，唐廷植是研究者創造的錯誤名。

[ 責任編輯 陳超敏 ]

[ 校對 吳浩彭 黃耀岷 ]

<sup>①</sup>蘇精：《西醫來華十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210頁。

<sup>②</sup>湯開建：《唐廷樞家族與澳門關係考述——以唐氏家族族譜及〈中國叢報〉資料為中心》，林廣志主編：《唐廷樞研究》第1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1—27頁。

<sup>③</sup>趙殿紅：《唐廷桂等華人致加州州長畢格勒的公開信》，林廣志主編：《唐廷樞研究》第1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155—161頁。

<sup>④</sup>施其樂（Carl T. Smith）著；袁琴、何寧宇譯：《中國近代工商業先驅——唐氏兄弟之青年時代》，林廣志主編：《唐廷樞研究》第1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98頁。

<sup>⑤</sup>何寧宇：《唐廷樞：中國近代工商業先驅》，《嶺南文史》（廣州）2019年第1期，第49—56頁。

<sup>⑥</sup>李梓傑：《唐廷桂兄弟與格致書院》，微信公眾號“香山研究”，2020年6月26日。

<sup>⑦</sup>賓睦新譯，項方校對：《通商口岸的仲介精英：唐茂枝及其上海夥伴1873—1890》，微信公眾號“香山研究”，2020年11月18日。

<sup>⑧</sup>鄧潔：《容閩和留美幼童》，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20年，第11、90頁。